

文



底

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

傅国涌／著

WEN REN DE DI QI

BAI NIAN ZHONG GUO YAN LUN SHI JIAN Y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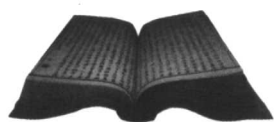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文
人
的
底
氣

傅国涌／著



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

WENRENDE DIQI
BAI NIAN ZHONG GUO YAN LUN SHI JIAN YING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傅国涌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1
ISBN 7 - 222 - 04935 - 5

I. 文... II. 傅...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821 号

责任编辑：赵石定 陈粤梅

装帧设计：杨晓东

责任印制：刘伟能

书 名	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
作 者	傅国涌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 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排 版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 - 222 - 04935 - 5
定 价	30. 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傅国涌 1967 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史等。1999 年以来，在《南方周末》、《新京报》、《书屋》、《随笔》及《社会科学论坛》等近百家报刊发表文章约 200 万字，作品入选《大学人文读本》等多种选本及高中语文教材（山东人民版）。评论家李静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04 中国随笔年选·序》中评价说：“傅国涌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他使用史料的方式是轻柔自然的，没有学问家的卖弄和僵硬；语言也是简洁温暖的，以确切为限但绝不粗陋。”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1 月）

《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7 月）

《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

《笔底波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5 月）

《百年寻梦》（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5 月）

《发现廿八都》（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4 月）

《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7 月）

《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

《偶像的黄昏》（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2 月）

《过去的中学》（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4 月）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目录

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几个时代 /1

我所理解的言论史是什么? /1

我为什么重视百年言论史? /3

百年言论史的几个时代及其主要特征 /4

漂浮的木板——重读百年言论史 /18

殉道者的血要比墨水珍贵 /18

新型的载体 /21

划落的流星:《苏报》、沈荪和秋瑾 /22

滋养过少年胡适的《时报》 /26

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29

唐绍仪:“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31

帝制梦中间世的《青年》 /33

“五四”的波澜 /34

“萍水相逢” /36

“且介亭”的“匕首”、“投枪” /40

“用真姓名发表负责的文字” /42

“昏黑”年头的亮色 /45

史量才和蒋介石的对话 /49

朱惺公直面死亡 /52

《大公报》的新纪元 /55

徐铸成:“《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58

《新民报》的“兼收并蓄” /61

成舍我的“世界” /65

“拒检”运动 /69

文人的底气

——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

“我们的抗议” /71

知识分子联名表达的传统 /73

《新华日报》的呐喊 /75

“百年绝响” /77

梁启超：从呼唤“新民”到“国民” /82

“‘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 /82

他的主要身份还是一个知识分子 /87

实践层面的“国民”意识 /88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91

“爱国心”与“自觉心” /92

“德先生”和“赛先生” /93

“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96

回归“德先生” /99

“文章报国”：百年回首《大公报》 /103

“矮人国”里的“巨无霸” /103

前无古人的“四不” /105

从张季鸾到王芸生 /107

“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发言权” /110

“星期论文”的创举 /114

文人的底气——“三一八”枪响之后 /118

鲁迅正视淋漓的鲜血 /118

周作人没有沉默 /121

朱自清记住了韦杰三的微笑 /123

蒋梦麟、林语堂、梁启超、闻一多、徐志摩的哀愤 /125

刘半农和赵元任的词曲 /127

《现代评论》：“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

受制裁吗？” /127

邵飘萍和《京报》/129

无权者的权力 /131

另一个周作人 /133

谴责“大残杀”/133

反对专断和卑劣 /136

站在女师大学生一边 /138

“四一二”以后的“光荣”/139

“最不喜欢谈政治”/141

遥望自由主义的背影：从胡适说起 /143

《新月》论政的高峰 /143

民主与独裁的论战 /148

“一条历史的公式”/149

《民主与反民主的观念体系的冲突》/151

没有产生自由主义运动 /153

鲁迅：以笔回敬手枪 /155

不带钥匙出门 /155

左、中、右都有的民权保障同盟名单 /158

吸纸烟不用火柴 /159

“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161

书生论政——我看罗隆基 /165

光华四射的《新月》政论 /165

“罗隆斯基”和第三大党梦 /169

王实味：追求人性 /173

人性论 /174

《野百合花》/176

《政治家·艺术家》/178

“软骨头”与“硬骨头” /180

悲剧的意义 /181

“深入生活的底里”——重读叶圣陶 /183

自称“平庸” /183

“忍无可忍” /185

“满腔的愤怒” /185

“他们杀伤你们，我知道也会杀伤我” /187

“第二号病患者” /188

“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189

“书生之见，也许很迂” /191

“什么道理？” /192

“多说没有用，只说几句” /193

郑振铎的“新社会”之梦 /196

《新社会》 /196

《公理日报》 /198

“唯有一腔正气耳” /200

《民主》周刊“被生生地扼死了” /201

“始终抱定匹夫有责的观念” /206

李敖仁：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208

“公民专家” /208

《老百姓》报 /211

“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212

幸免于难 /214

储安平在时间中复活 /217

被删节的文字 /217

《观察》的高峰 /221

“储安平正在复活” /223

傅雷怒目金刚时 /226

不悔的子冈 /229

穿着大红毛衣跑来跑去 /229

“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折腾” /233

“我要像小鸟一样起飞” /236

恽逸群的忠诚 /238

舆论界的“彗星” /238

蒙冤三十年，他说自己“不为物移，不为己忧” /242

忠诚的理想主义者 /243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从百年中国言论史说起 /246

以暴易暴和成王败寇 /246

两个阳光人物 /248

新闻纸的出现 /252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254

夹缝中的空间 /257

“开天窗” /258

“署真名、负责任” /259

“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 /261

“我愿抱独身主义” /267

后记 /271

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几个时代

我所理解的言论史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以往，我们总是讲思想史、学术史，我刻意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目的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我们曾经把舆论界又称为言论界，也就是现在说的公共空间。

我之所以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首先是要把它与思想史区别开来。在我看来，言论史关注的是当下，而思想史可以事后挖掘。比如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张中晓、顾准、林昭这些先驱者，他们当年的那些思想都是属于抽屉、档案柜，属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字，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没有一定的载体能够公开发表出来，所以他们只属于思想史，而无法进入言论史的视野。言论史当中的言论，必须通过某一载体，包括报纸、杂志或后来的广播、电视、互联网，乃至学校的讲台、公共集会上的演讲。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报刊这样的公共平台，通过这些载体表达出来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它称作言论；而没有公开表达出来的，只是自己放在抽屉里，写给自己看的，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就不能成为言论史关注

的话题。所以在中国言论史上，我们可能找不到顾准的身影，听不到张中晓的声音，更看不到林昭用鲜血写下的那些文字，这是言论史与思想史的不同。

其次，言论史和我们往常习惯所说的新闻史、报刊史、报业史也有很大的不同。言论史所涵盖的面要比新闻史、报刊史、报业史更大、更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新闻史是讲到鲁迅的，为什么会讲到鲁迅呢？不是因为鲁迅在新闻史或者报业史上有多么重要，或者他办过什么重要的报刊杂志，他是经手办过一些杂志，但那主要是一些文学期刊。在新闻史的格局中，鲁迅其实并不重要，之所以我们在新闻史上会讲到鲁迅，那是因为在鲁迅身后，他的地位被拔高了、被神化了，用三个“伟大”、七个“最”给鲁迅下的定语，就标志着鲁迅的地位已经不是与他身前实际身份相符的地位了。所以不论我们讲什么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乃至新闻史，都要把鲁迅写进去，甚至一章、一节地写。实际上，讲新闻史是未必要讲鲁迅的。

那么言论史与新闻史的区分到底在哪儿呢？我想，比如说胡适办过《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你要把他写进新闻史、报刊史也是可以的，但他算不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而放在言论史上，胡适就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一生，始终恪守一句话，叫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个字是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范仲淹还讲过一句比这更有名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实际上它的这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宋代以来 1000 多年里，在中国读书人当中一直是十分重要的。胡适一生给他的朋友、学生留墨宝时，经常会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字箴言，胡适的一生是与言论史分不开的。还有一个人物，傅斯年，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但是在报刊史、新闻史上我们是找不到他的位置的——他虽然年轻时办过《新潮》，在新闻史上并不重要。但在言论史上，傅斯年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在 1947 年，他在中国言论界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他在《世纪评论》、《观察》、《大公报》这些当时非常重要的报刊上发表了炮轰皇亲国戚、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大文章，当时影响之大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他的文章发表不久，宋子文就鞠躬下台了。当然历史研究表明，宋子文

的下台，不仅仅是因为傅斯年写了几篇文章，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呼吁，还有其他一些政治上的错综复杂的内耗、内斗的原因。但是，当中也确实包含了傅斯年、胡适等知识分子的努力在内。所以，放在言论史上，傅斯年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人物。不仅是1947年，在1947年前，他在《新潮》上的言论、他在《大公报》执笔的“星期评论”以及《独立评论》上的文章，都曾经影响了几代人。如果我们把视野局限在报刊史、新闻史，那么傅斯年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优秀的知识分子，怀抱文章报国的理想，推动中国文明进步所做出的努力，用言论史这个说法可能更能涵盖。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过很多的梦想。他们试图以实业报国，以教育报国，以科学报国，以乡村建设报国，这当中贯穿始终、影响巨大并形成了文人论政传统的，就是言论报国的理想。自1874年王韬先生在香港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具有评论性质的独立报纸《循环日报》以来，到1948年12月蒋介石下令关闭上海《观察》周刊，75年间，几代知识分子耿耿于怀的是他们的文章报国之志、言论报国之志。其中，涌现出了张季鸾、邵飘萍、林白水、胡适、鲁迅、傅斯年、王芸生、胡政之、储安平等一系列重要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提出言论史这个说法来代替以往习惯的新闻史、报业史等说法，也为了与思想史这个说法有所不同。

我为什么重视百年言论史？

在我看来，言论是一个民族生命的根系所在，是世界的公法，是文明进步的主要尺度之一。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文明社会有一些基本的尺度，其中，有没有言论的空间，有没有言论的自由就是主要的标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遭受着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威胁，在大西洋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次世界性的会晤。这次会晤产生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而且我们知道，罗斯福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那就是“四大自由”。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受记者的书面采访时，就曾说过，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就是要实现罗斯福所讲的四大自由，这“四

大自由”就是：信仰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中缺了一个，这个社会恐怕就算不上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中国自有宪法以来（如果我们把第一部宪法上溯到1912年的《临时约法》的话），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从90多年前我们的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颁布以来，每一部宪法中一定都把言论自由写进去了。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他一定都不会在嘴巴上否认“言论自由”这四个字。我们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通过的，其中第35条就庄严的写入了“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从世界范围内来看，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就确立了人类享有不分空间、不分时间，寻求自由表达的权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合国通过的，现在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庄重地承诺了：所有人享有不可剥夺的表达的权利。所以，无论从我们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个尺度——言论的尺度都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如何表达我们的心声，说出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感受？言论的尺度是首要的。我之所以花费时间、心思去寻找百年历史上那么多先辈们走过的带着鲜血的、带着汗水的足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换一句话说，没有表达的自由，没有在公共载体上说出我们意愿的自由，那么一个民族的生机就会被斫丧，一个民族的活力就会荡然无存。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表达的自由，什么时候我们的权利就是不完整的，我们的社会就是有缺陷的。所以我想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展开我们追求美好未来的历程。

百年言论史的几个时代及其主要特征

在我看来，百年言论史是从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始的。王韬卒于1897年，在王韬去世的那一年，梁启超主笔的上海《时务报》已经风行一时。但是王韬本身，我认为他还没有构成一个时代，那是中国百年言论史的萌芽时期，在这个萌芽时期，王韬在香港执笔论政，呼唤改良，呼唤变法，直接启蒙和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后来变法维新的主角，但是由于他的报纸远在香港，虽然经常被上海的一些报纸转载，如外国人办的《申报》转

载，但他的影响还不构成一个时代的影响，真正在百年言论史上（第一个）可以构成一个时代的，在我看来是“梁启超时代”，可以把梁启超的名字作为时代来命名。

梁启超，严格地说，他办的第一个杂志是在1895年，在北京办的《万国公报》，这个杂志的名字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一个很有名的杂志是重名的。后来，因为版权问题，美国人提出你这个杂志和我的名字一样，就像《读者文摘》原来和美国的《读者文摘》重名，官司打输了，改成《读者》一样，当年他们也是主动改成了《中外纪闻》。这个杂志为期很短，办了不到一年，而且销量有限，每期印3000份，免费赠阅，对象是达官贵人，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沿门丐阅”之时——那是要和邸报一起免费赠阅的。到了1896年，“梁启超时代”正式拉开序幕，梁启超、汪康年这些中国转型时期第一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其实这是一个杂志，一个旬刊，十天一期，正是通过这个杂志，变法维新的声音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24岁的梁启超以他的言论登上了历史大舞台，他的影响之大，一时甚至盖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但是由于汪康年与康梁之间的矛盾，1897年梁启超离开上海《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当教师去了。当然，做教师他也有成绩，教出了像蔡锷、范源濂这样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蔡锷这个人，虽然是个军人，但是个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他拿着枪说出了“为国民争人格”这样的话。梁启超在《时务报》到《新民丛报》之间还办过《清议报》，后面还办了《国风报》、《政论》杂志，还有辛亥革命后办的《庸言》杂志。在他一生中，至少与22家报刊有密切的联系，其中，10个以上的报刊是他亲自参与的，7个是他亲自主编的。影响最广、最深的是他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与《时务报》一样，也是一个杂志，而非报纸，是一个月刊，《新民丛报》从1902年到1907年，只生存了5年，但是它的影响之大，远不是时间所能涵盖的。在《新民丛报》停刊之后，人们还把《新民丛报》的旧杂志拿来，当作自己启蒙的材料。所以，很多与梁启超在政治立场上并不一致的人，很多倾向革命而非改良的人，包括辛亥革命时期非常活跃的湖南人，同盟会的元老谭人凤先生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要走上反对清政府的道路，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因为受了孙中山先

生三民主义的影响，而是读了梁启超编的那些杂志，看了《新民丛报》、《时务报》，心中觉得有一股不平之气，有一种对文明世界的向往，所以他要走出来，这样走上了革命之路。梁启超影响的不只是一代人，包括毛泽东、邹韬奋、王芸生在内，中国几代的历史人物都曾经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那些文字，被人称为“新民体”。那么，他到底有什么魅力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读书人？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文章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但是，我觉得，仅仅用文字上的感染力来谈论梁启超对一个时代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梁启超对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最大的影响还是那三个字：开风气。梁启超在一首诗中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十年之后当知我”，他觉得自己走在时代的前面，他所提出的东西人家往往要10年以后才能理解他。

我把“梁启超时代”大致界定为从他创办《时务报》到《新民丛报》停刊这10年间。这10年是“梁启超时代”的黄金时代，是它的最高潮，从那以后，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以后，梁启超的时代在走下坡，新的人物、新的报刊在崛起。包括上海租界里出现了于右任先生创办的三个“民”报，三张报纸，前后延续——《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后来那张直接呼唤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的著名报纸——《民立报》。但是梁启超的影响始终存在，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到中国，马上创办了《庸言》杂志，发行量很快超过1万份，在当时的中国，民智未开，受教育的人口相当少，一份新办的杂志，销量可以超过1万份，这不是我们今天一般的杂志所能想象的。我们现在国内读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像《书屋》杂志，发行量也不过2.5万份。那么在90多年前，民国初年，梁启超在国外流亡了16年之后回国，一创办杂志，发行量就能突破1万份，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发行量。到了1915年，当袁世凯黄袍加身要称帝的时候，正是这位在言论史上已经逐渐落幕的梁启超先生，写下了雄篇巨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之大，震撼之巨，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无法想象了，当袁世凯得知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反对他，他马上派人给梁启超送去20万元大洋，就是跟梁启超谈判，能不能不发这篇文章，不发，就20万，以后还可以再加，钱没有问题，只要不发文章就行。当然，梁启超断然拒绝了。这件事，梁

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在天津的租界里商量的时候说，蔡锷，你是军界大有力量的人，你跟我大不一样，我只是一介书生，对我来说，袁世凯要做皇帝，我就要堂堂正正的反对他，否则的话，中国的读书人最后的一点气骨都没有了。你不一样，你有力量，你要韬光养晦，不要让袁世凯看出你有异心，以风花雪月来掩饰自己，寻找机会，回到云南去，用武力反对袁世凯。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很快就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像上海的老牌报纸，外国人办的《申报》——这时候已归入史量才名下，就分两次转载了这篇长达一两万字的文章，一时举国上下争相传阅。这是梁启超在言论史上最后的一轮辉煌之一。在袁世凯皇帝梦破灭，一命呜呼之后，梁启超本来打算退出言论界，退出政界，一门心思地去做他的教育事业。他向很多记者，包括给他女儿的信中都一再表示他要从此退出政界，退出报界，他要一门心思地去做老师，去办教育，他认为教育是根本的救国之计。但是时代的问题由不得一个读书人自己去想象，就在他想要去做教师的时候，中国又发生了变局，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了，当时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中是谁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复辟——仍然还是梁启超。他写下了反对复辟的通电，他说，我，一介书生，手无寸铁，我今天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观点堂堂地亮出来，我相信，凡是有一点人气的人，都会像我一样做。事实证明，张勋复辟只维持了12天，比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还要短得多，从那之后，在中华大地上，无论你拥有百万雄兵，还是拥有多如牛毛的中统、军统、蓝衣社、白衣社，要想戴上有形的皇冠，称孤道寡，几乎已经没有机会了。

梁启超在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皇权社会带入一个共和社会的过程中，他的言论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是无比巨大的。但是梁启超并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曾经几度介入政治，做了官，从了政，当过熊希龄人才内阁的司法总长，当过币制局总裁，后来当过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当然，他当官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两年，在他的一生中，两年不过是个零头而已。但是，这两年给他带来的负面伤害远远超过了他十几年的流亡生涯。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推动社会进步，做他更应该做的事，梁启超的例子是很鲜明的。从本质上说，梁启超是一个论政的人，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他自己也对